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唐诗说稿

杨恩成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唐诗说稿

杨恩成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诗说稿 / 杨恩成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ISBN 978 - 7 - 100 - 10334 - 3

I. ①唐… II. ①杨… III. ①唐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41437号

国家“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唐诗说稿

杨恩成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0334 - 3

2013年12月第1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5 7/8

定价: 50.00元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编 委 会

顾 问：霍松林

主 编：张新科 李西建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歌东	尤西林	冯文楼	邢向东
李继凯	李 强	刘生良	刘锋焘
杨恩成	吴言生	张学忠	赵望秦
赵学勇	胡安顺	党怀兴	高一农
高益荣	程世和	傅功振	傅绍良
曾志华	霍有明	魏耕原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 工作委员会

顾 问：霍松林

主 任：李西建 张新科

委 员：邢向东 赵望秦 霍有明 刘锋焘

赵学勇 李继凯 尤西林

总 序

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历时最久的都市，先后有 13 个王朝建都于此，绵延 1100 余年，形成了辉煌灿烂的长安文化。长安文化具有多种特性。第一，它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以长安和周边地区为核心，以黄土为自然生存环境，以雄阔刚健、厚重质朴为其主要风貌，这种文化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富有强大的生命力。20 世纪中国文学的“陕军”、中国艺术的“长安画派”等，显示出独特的魅力，可以称之为“后长安时代”的文化。第二，它是一种相容并包的都城文化，既善于自我创造，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又广泛吸纳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文化，也善于吸纳民间文化，形成多元化的特点。第三，它是中国历史鼎盛时期的盛世文化，尤其是周秦汉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其所产生的文化以及对外的文化交流，代表了华夏民族的盛世记忆，不仅泽被神州，而且惠及海外。第四，它是历史时期全国的主流文化。由于长安是历史上许多王朝的都城，是当时政治文化的中心所在，以长安为核心形成的思想、文化，辐射到全国各地。第五，它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产生于中国历史的早期，是中国文化之根，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形成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对长安文化进行研究，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更有了新的起色，尤其是“长安学”、“西安学”的提出，为长安文化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并受到海外学者的关注。陕西师范大学地处古都长安，研究长安文化是学术团队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深入挖掘长安文化的内在价值，探讨长安文化在中国文化、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借国家“211工程”三期建设重点学科之机，以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为龙头，全面整合文学院学术力量，申报了“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项目，获得国家教育部的支持。本项目的研究，一方面是要发挥地域文化的优势，进一步推动长安文化的研究，并且为当代新文化建设贡献力量；另一方面也为研究中国文学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使文学研究有坚实的文化根基。这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尝试，我们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方向：

第一，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的演变

立足文学本位，充分发挥地理优势，以长安文化为背景，对中国文学进行系统研究。1.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精神。主要研究长安文化的内涵、产生、发展、特征以及对中国文学精神所产生的影响。2. 汉唐文学研究。主要研究长安文化形成时期以《史记》和汉赋为代表的盛世文化的典型特征以及对后来长安文化的奠基作用，研究唐代作家作品、唐代文化与文学、唐代政治与文学等，探讨汉唐时期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3. 汉唐文学的域外传播。主要对汉唐文学在域外的传播、汉唐文学对域外文化的影响、长安文化对域外文化的接受等问题进行全面研究。4. 古今文学演变。以长安文化为切入点，探讨长

安文化辐射下“后长安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以及陕西文学的内在演变。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长安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以周秦汉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内涵。本项目首先需要从不同的层面对长安文化进行理论总结和阐释，探讨长安文化对中国文学精神的渗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长安文化对中国文学演变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汉唐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转折期，也是长安文化产生、发展乃至鼎盛的重要时期。所谓“汉唐雄风”、“盛唐气象”就是对这个时期文学的高度概括。不仅如此，汉唐文学流播海外，对日、韩等汉语文化圈国家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域外传播，可以从新的角度认识汉唐文学及长安文化的价值意义。今天的古城长安（西安）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形成新的文化特征。通过古今文学演变研究，探讨、总结中国文学和陕西文学的发展规律，进而为长安学（或西安学）的研究奠定良好基础。

第二，长安与西北文化

立足于长安文化，突出地域文化特色。主要有：1. 西北重点方言研究。关中方言从汉代开始即对西北地区产生辐射作用，这种作用在唐代以后持续不断，明清两代更有加强。因此，西北方言与关中方言的关系极其密切。从古代直到现代，西北的汉语方言与藏语、阿尔泰语系诸语言发生接触，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异。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我们的任务之一。2. 秦腔与西北戏曲研究。在长安文化的大视野下研究长安文化对秦腔及西北戏曲形成发展的影响；同时以秦腔及西北戏曲为载体，研究戏曲对传播长安文化所起的作用，从而显现长安文化在西北民族文化精神铸造中的巨大作用。

3. 西北民俗艺术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研究。主要研究西北民俗文化特征、形态以及对精英文化的影响,研究如何保护和利用文化遗产并为当代文化建设服务。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加强西北地区代表性方言的研究,对西北方言史、官话发展流变史、语言接触理论研究等,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秦腔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号称中国梆子戏家族的鼻祖,是长安文化的活化石。秦腔诞生于陕西,孕育于秦汉,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末清初,受到西北五省(区)人民的喜爱,已经入选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西北民俗的中心在陕西,陕西民俗文化是西北民俗文化的发源和辐射中心地。陕西民俗文化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形式,对社会个体和整个社会都有重要意义。同时,陕西曾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之一,作为最早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点,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方面。对于这些遗产的整理、保护以及利用,不仅可以加速社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也可以构建和完善中国文化的完整性。

第三,长安文化经典文献整理与研究

对长安文化经典文献进行整理与研究,主要内容有:1.“十三经”的整理与研究。主要完成《十三经辞典》的编纂任务。之后,再进一步进行“十三经”的解读与综合研究,探讨经典文化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2.与长安文化有关的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本项目拟对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的古代文学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如重要作家的诗文集等),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

确立本研究方向的依据在于,“十三经”与长安文化关系密切,

保存了先秦时期的重要文献,尤其是《诗》、《书》、《礼》、《易》几部经典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属于以丰镐为都城的西周王朝的官方文献。“十三经”既是早期长安文化的标志性成果,也是秦汉以来长安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内容涉及古代文化的许多方面,诸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民为本的治国原则、和谐人际的伦理主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重视德操的修身境界等等。这些思想、精神渗透在民族的性格与心理之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另外,长安文化形成时期,产生了许多经典文献,经、史、子、集均有保存。许多文人出生于长安,或游宦到长安,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对长安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是研究长安文化的基础,需要进行细致的整理。

围绕以上三个方向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对长安文化进行较全面的认识,尤其是对长安文化影响中国文学的诸多问题有开拓性的认识。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和化德传媒有限公司、三秦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拟把研究成果以不同的丛书形式出版,目前已启动的有《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长安文献资料丛书》、《陕西方言重点调查研究》等。《十三经辞典》已经出版十卷,我们将抓紧时间完成其余工作,使其成为完璧。总之,通过“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项目的实施,我们要在学术上创出新特色,在队伍上培养出新人才,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同时也为国家与地方文化建设及文化遗产保护做出一定的贡献。

“长安文化与中国文学研究”工作委员会

2009年11月22日

目 录

论盛唐文化与盛唐文学	1
论唐代文化与唐代隐逸	21
附势与媚俗——唐代诗人人格的另一面 ——以李白、杜甫、高适为中心	55
谈“长安文化”和唐诗中以长安为主题的诗	67
论唐代咏史诗	88
杜甫的人生历程与诗歌创作	131
杜诗在唐宋时期的流传与接受	249
说杜诗的“村”	272
关于“大历文坛”的整体思考	290

论骆宾王 317

骆宾王生卒年考辨 339

宋之问与骆宾王联句质疑 348

说《长恨歌》 355

从王维的两首诗看唐诗注解中的一些问题 481

说桃花 487

后记 493

论盛唐文化与盛唐文学

唐玄宗开元（713—741）、天宝（742—765）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文学史家称之为“盛唐”时代，并把“开元之治”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可以看出唐玄宗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开元、天宝前后共四十四年，加上唐玄宗登基的先天元年，唐玄宗在位共四十五年。当然，唐玄宗最后的结局并不好，他的儿子发动马嵬坡兵变，把他赶下台，还搭上了他晚年最宠爱的妃子杨玉环。所以，晚唐诗人李商隐就责备唐玄宗：“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指责总归是指责，历史毕竟是凝固了的现实。不能因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风流韵事而否定其在历史上的功绩，毕竟唐代文化的高峰就出现在唐玄宗执政时期。

从广义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个时代，开元、天宝时期，无论是精神生产，还是物质生产，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这一时期堪称整个唐代文化的巅峰。仅以当时的户口数（封建社会很重视这一点）为例，开元十四年为 7069565 户；到天宝十三载，增加到 9069154 户，总人口达到 5400 多万。户口与朝廷的财政收入有着直接关系，朝廷控制的户口的多寡，标志着社会稳定与否。这一点，可以从杜甫晚

年所写的《忆昔二首》得到印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据《旧唐书》记载，开元末，京都大邑，“斛米不盈三百钱”。也就是说，一斗米不到三十个铜钱。当时，“天下义安，虽行万里，不持寸刃”。——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盛唐文化呈现出非凡的博大气象。尤其是盛唐文化所呈现出的开放性、兼容性在中国封建社会更是空前绝后的。盛唐文化的博大与恢宏的特质对盛唐文坛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盛唐文化的开放性

王维有一首《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其中有两句诗很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特点：“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首诗虽然写于“安史之乱”未平、唐肃宗刚刚收复长安以后，长安城已经失去昔日辉煌壮丽的气势，王维写出这样的诗句，显然是在粉饰现实。但是，用这两句诗概括开元天宝时代，则是十分恰当的。因为，在开元天宝时代，唐王朝以其文治武功而称雄东方，威名远及四海，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对当时的世界文化，特别是对东方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日本、高丽、新罗、黑衣大食（今伊朗、土耳其一带）等纷纷遣使来朝。唐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诸如吐谷浑、吐蕃、南诏、回纥、突厥等多因受唐王朝先进文化的影响而内附。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向西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诸国。唐王朝通过这条国际通道与西亚诸国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以扬州、泉州、广州为基地的出海口，发

展了唐王朝与日本、朝鲜半岛及东南亚的友好关系。唐王朝的国都长安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大都市。佛教、基督教（唐代称景教）、伊斯兰教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以后，在盛唐时期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唐王朝以其博大与恢宏的气概接纳了域外文化，而盛唐文化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开放性的文化特质。

与此相联系，盛唐文化又呈现出它特有的兼容性。这种兼容性是统治者自信的体现。

唐以前，思想界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杂家等许多学派。儒、墨、道、法四家在先秦时代很有名。但是，在社会认可程度上，儒家和墨家属于显学，法家和道家属于旁流。

中国思想界的第一次文化专制发生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秦尚法，对于其他思想学说采取排斥态度。秦始皇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就不能延续奉周王室为正统的儒家学说。所以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政权，秦始皇做了一件让文人千古唾骂的事：焚书坑儒。结果，秦朝很快灭亡了，于是就给后人留下了口实：秦尚法而亡。晚唐的章碣就说：“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你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实行焚书坑儒政策，可是，造反的刘邦和项羽都不是念书人。章碣的话说得有点儿绝对，刘邦不是没念过书，而是念书不多，可是治国很有一套。他入主长安以后，实行王霸并用政策。汉文帝、汉景帝又崇尚黄老思想，出现了史家所称道的“文景之治”。所谓“文景之治”就是提倡休养生息的思想所带来的积极成果。

学术界多认为：汉武帝一改旧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这一论断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汉武帝只是把儒家的地位摆到了比较突出的地位罢了，比如设立“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儒

家学说的“经学”地位也是在这时确立的。汉武帝把《诗》、《书》、《礼》、《易》、《春秋》作为儒家经典，其他学说并没有被彻底废除。他本人就是这样——痴迷道家方术和养生观。他下令铸造金铜仙人，树立在建章宫，让那个铜人手捧玉盘承接天上的“仙露”，然后和着玉屑自己喝。不过，汉儒已经不同于先秦儒，汉儒把“天”人格化，并且提出了“天人感应说”，其目的在于把皇权神圣化。连司马迁在谈到《史记》的撰写目的时也说要通过修书，达到“究天人之际”的目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尽管南移，却呈现出衰微的趋势，崇尚自然的老庄学说取而代之。玄学则是在道家学说影响下衍生出的另一种文化思潮。在儒学南移之后，北方地区在少数民族统治下，出现了短暂的文化空白。于是，佛教乘虚而入，占领了北方的文化阵地。在战乱频仍的北朝，人们把生的希望寄托于来世。因此，到了北朝后期，佛教大兴。杨隋在短短的三十几年里，也是以崇佛为主，不过，儒学的地位开始有所抬升，出现了王通这样的大儒。

进入唐代以后，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的出现，标志着儒学的复兴。因为在隋朝以前，北方的文化思想是佛教一统天下。敦煌石窟、敦煌附近的榆林石窟、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多有隋朝以前的佛教雕像可以予以证明。到了盛唐，儒学大兴。所不同的是，唐儒更偏重于理想型的儒学。老庄学说的代表人物之一老子被李唐王朝奉为远祖，致使老庄学说的地位一下子被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开元时，《老子》成为科举考试中的必考科目。老庄并提，实际上是统治者遵奉老子，文人则是向往庄子所倡导的人生境界，并因此而影响了唐代诗歌的艺术精神。所以，庄子是沾了老子的光。到了天宝元年，庄子才被

封为“南华真人”，《庄子》一书也被奉为《南华真经》。

佛教在唐代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唐朝初期，唐高祖李渊对佛教就有一个从尊崇佛教到抑制佛教的变化。

李渊起初受隋文帝崇佛的影响，也是尊佛的。但他真正从佛，据说和李世民有关。《旧唐书·张仲方传》记载，李世民九岁的时候得了病，李渊派人到荥阳大海寺去求佛祈福，李世民病愈，李渊“造石佛一尊，刊勒十六字以志之”。李渊由此很敬佛。所以当李渊率兵打到华阴时，曾亲临佛寺求佛保佑。而且在他即位以后在一些诏令中也是把佛教排在道家前面，表现了尊佛的倾向。于是，佛教在社会上开始盛行。然而为时不久，崇佛的倾向所带来的弊端也显露出来，以致有大臣上书指陈佛门“不忠不孝”、“游手游食”、“易服逃赋”。辩论的结果，促使李渊采取了抑制佛教的措施，转而崇道。先是在晋州立老子庙，并把老子遵奉为“皇祖”，接着在武德八年又向天下宣布道家第一，儒家第二，佛为第三。

武则天为了达到变唐为周的政治目的，开始唐王朝的又一次崇佛。皇宫有重大庆典时，和尚、道士都被邀请入宫，参与盛典。在入宫顺序上，起初是道士排在前面。后来，因武则天崇佛，就让和尚排在道士前面，引起朝臣不满。议来议去，最后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道士和和尚并排行进。这表面上是一个次序的调整，实际上体现了武则天在崇佛的同时又不能不采取对佛、道二家的兼容政策。变唐为周的政治色彩反而被相对淡化了。

佛与道的争论并没有影响到儒家的正统地位。

唐玄宗在即位初期，汲取前朝的教训，下诏通过“考试”的形式，淘汰了大量的“假和尚”，抑制了“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